慕良泽，刘新秀．文化网络再造与乡村治理机制创新——以山西中部义庄村家谱编纂为例［J］．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25（2）：94-105.
MU Liangze，LIU Xinxiu. Cultural network reconstruction and innovation in rural governance mechanisms：a case study of genealogy compilation in Yizhuang Village，Shanxi Province［J］. Journal of Shan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2026，25（2）：94-105.
DOI：10.13842/j.cnki.issn1671-816X.2026.02.009

文化网络再造与乡村治理机制创新

——以山西中部义庄村家谱编纂为例

慕良泽，刘新秀
（山西大学 乡村振兴研究院，山西 太原 030031）

摘 要：本研究以山西中部的“分裂型”村庄义庄村为例，探讨传统文化资源如何通过符号生产、规则嵌套与技术赋能三重机制实现文化网络再生产，激活乡村有效治理。研究发现：符号生产机制方面，保护型经纪人通过重构文化符号，将宗族记忆转化为公共认同，为村庄治理提供文化合法性；规则嵌套机制方面，将情感性规范与现代管理制度相融合，在维系传统道德权威的同时提升治理效能；技术赋能机制方面，依托数字媒介打破时空限制，使不在村的村民实现“脱域参与”，技术经纪人通过线上协商调和宗法观念与现代价值的冲突。研究表明，“分裂型”村庄实现乡村振兴不仅需要外部资源输入，更需激活本土文化网络的治理潜能，从而重新联结分裂个体实现有效乡村治理。

关键词：文化网络；乡村治理；符号生产；权威调适；技术嵌入；分裂型村庄
中图分类号：D3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16X（2026）02-0094-12

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综述

（一）问题的提出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1]。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进程加速城乡文明的碰撞与交融，深刻改变乡村社会面貌。然而，受经济政策和资源分配双重制约，乡村发展长期滞后于城市，引发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规模外流，村庄内部社会关联减弱，集体行动陷入困境，由此形成“分裂型村庄”并引发三种结构性困境：其一，内生动力持续衰竭。作为乡村发展的核心要素，农村青壮年人口流失直接导致农业生产效率下降，农村人口空心化会进一步引发产业空心化、文化空心化和社会碎片化等多重危机[2]。其二，社会关系形态发展变化。在城镇化与市场化冲击下，费孝通笔下的传统“熟人社会”正被原子化社会形态取代。在华北地区广泛存在的“分裂型村庄”[3]中，这一进程尤为显著。其以“小亲族”为基本行动单位的固有社会结构，在外部冲击下更易加剧内部疏离。礼治秩序式微导致村庄治理危机，留守群体参与公共事务意愿低迷，形成“人才流失——治理失效”的恶性循环。其三，村落文化认同逐步消解。传统乡村的政治秩序依赖于乡村文化网络中蕴含的乡村文化权力和自治实践，这种借由文化权力所形成的柔性和简约治理方式是几千年来中国乡村社会有效治理的密码[4]。当下城镇化所产生的虹吸效应持续吸纳乡村资源，可能导致乡土文化根基瓦解。正如胡惠林所言，破局关键在于通过“精神脱贫”在现代化过程中重建共同体意识，以文化激活村庄公共事务，阻断“村落终结”趋势。但值得关注的是，2022年初至2023年末，山西省中部义庄村呈现的悖论性现象与乡村社会普遍衰退形成鲜明对比。作为一个同样面临

收稿日期：2025-10-31 **修回日期：**2025-11-2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发展型治理的结构优化与效能提升研究”（22AZZ006）
作者简介：慕良泽，研究方向：乡村发展与乡村治理研究。

青壮年外流、凝聚力持续下降的“分裂型”村庄，该村却自发掀起家谱编纂的集体行动热潮，并顺利完成家谱的编纂工作①。这一案例印证王亚华的观点：“乡村振兴本质是文化振兴，内生动力才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5]。徐勇的研究同样揭示：宗族记忆、乡规民约等传统文化要素仍具有激活集体行动的潜力[6]。按照村庄类型进行划分，义庄村是个典型的分裂型村庄[3]。本研究基于实证分析，细致呈现分裂型村庄通过激活传统文化因子，达成集体行动的过程，为验证上述研究提出的乡村社会仍蕴藏着突破结构性困境的文化韧性的观点提供强有力的经验支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以往关于乡村编修的研究主要形成两种研究路径：一种是从“工具论”视角出发，将家谱视为记录家族历史、确立家族叙事和明确成员身份定位的功能性文本[7]。另一种则是史学研究者将家谱特别是谱序作为重要的史料资源，运用于社会史、文化史等领域的研究[8]。这些研究虽然从不同角度揭示家谱的文献价值和史料意义，但存在两个明显的理论局限：其一，这些研究往往将修谱行为简化为一种静态的功能实现过程，未能深入考察其在社会变迁语境中的动态文化意义。其二，现有研究大多将修谱视为封闭的宗族内部事务，缺乏将其置于更广阔的乡村治理体系中进行整体性考察的学术视野。这种研究范式上的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制约学术界对当代乡村编修家谱现象的理解深度。

而杜赞奇提出的“权力的文化网络”理论为突破这一研究范式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该理论认为，传统中国的乡村治理并非依靠单一的行政体系，而是通过宗族组织、宗教仪式、市场关系和庇护网络等要素构成的复杂文化系统来实现[9]。在这个系统中，各种象征符号和规范相互交织，形成一张动态的权力网络。更有学者进一步指出，这种文化网络既是乡村社会中各种权威的来源，也是不同社会力量相互角逐的重要场域[10]。这一理论视角的引入，不仅弥补过去乡村研究中过度强调社会经济因素而忽视文化影响力的缺陷，更为理解家谱在乡村社会中的多重功能提供全新的思路。从文化网络的视角来看，家谱绝非简单的家族世系记录，而是一种具有多重文化意涵的社会文本。研究表明，家谱通过“序昭穆、别尊卑、辨亲疏”的书写方式，在传统社会中发挥着“敬宗收族”的重要功能[11]。有学者则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指出，修谱过程实际上是一种精心设计的文化实践，修谱者通过有选择的家族叙事建构，塑造出一种具有神圣性的家族记忆，从而唤起族人的情感共鸣[12]。许烺光的研究进一步揭示家谱的双重教化功能：一方面通过祖先的典范事迹对后代产生道德示范作用；另一方面则通过明确亲缘关系，强化家族内部的尊卑秩序和伦理规范[13]。上述研究表明，家谱在传统乡村社会中既是一种文化象征，也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治理工具。在当代社会转型的背景下，乡村修谱活动呈现出新的时代特征和治理价值。具体而言，这种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重要维度：首先，家规族约作为乡村社会中的非正式制度，为现代乡村治理提供重要的规范补充。许多研究发现，那些保留完整家谱的村落，往往能够更好地维持社会公序良俗，家谱中记载的家规族约实际上构成一套完整的道德规范体系[12]。其次，修谱过程本身具有显著的资源整合功能。弗里德曼等学者指出，家谱作为一种“政治声明”[14]，能够有效凝聚族人的认同感。在当代人口流动加剧的背景下，修谱活动成为维系“流动的团结”的重要文化载体[12]。实地调查发现，在当代修谱实践中，家族文化精英往往主动调适宗族活动与国家政策的关系，通过选择性记载等方式，使家族历史叙事与主流价值观念相协调，最终形成一种“官民互鉴”的新型治理格局[15]。

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乡村文化治理呈现出两个值得关注的新特征：一是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传统上由宗族长老垄断的修谱权，现在已经扩展到包括文化精英、返乡新乡贤、基层文化工作者等多元主体[16]；二是治理方式的柔性化，各地涌现出的“以孝治村”[17]等创新实践，表明传统文化资源正在被创造性地运用于村民自治、矛盾调解等治理场景。这些新发展既延续杜赞奇对文化网络治理功能的经典论述，又通过结合当代中国乡村的实际情境，丰富文化

① 出于学术惯例，本人涉及的地名和人名均做了技术性处理。

治理理论的内涵。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中国的修谱实践不仅是一种文化传承活动，更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治理创新。胡惠林指出，中国乡村治理本质上是一个在长期农耕文明中形成的具有自洽性的文化能力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家谱等传统文化载体通过创造性的现代转化，既保留文化传统的精髓，又回应当代社会治理的需求[18]。也有学者的研究表明，家谱编纂作为一种“贯彻孝治思想的具体行动”，在当代仍然具有“叙天伦、系人心、明教原、敦政本”的重要功能[19]。这些研究都指向一个共同的认识：在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文化资源可以通过创新性转化，成为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综上所述，从“权力的文化网络”理论视角重新审视民间修谱现象，不仅能够突破传统研究范式的局限，更能深刻把握其在当代乡村治理中的多重价值。当代修谱实践既延续传统文化网络的基本功能，又在治理主体、治理方式等方面展现出新的时代特征。这些变化既反映中国乡村社会的文化适应性，也展现传统文化资源在现代社会治理中的创新潜力。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探讨传统文化网络与现代治理体系的融合机制，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更加丰富的理论支持和实践启示。

二、案例导入与分析框架

文章研究的义庄村处于山西省中部，作为一个具有“分裂型”特征的城郊村落，在现代化进程中呈现出鲜明的二元特征：一方面，该村现有10个村民小组、800余人，包含义、郝、张等10余姓氏，因毗邻省会而面临村庄空心化等问题；另一方面，依托悠久的梨果种植传统，村民通过发展酥梨产业和研学旅游维持生计。这座始建于唐代的千年古村，至今保留着徘徊寺、关帝庙等历史建筑，其文化脉络尤其体现在义氏家族的发展史上。作为明初洪洞大槐树移民后裔，义姓族人得以在此落地生根，要归功于原住民郝姓族人的鼎力相助——两姓不仅世代通婚，更在垦荒置业等方面密切合作，至万历年间义姓已发展为村中第一大姓。作为村中望族，义氏自古秉承“以孝立家、以和为贵”的家训，其宗族活动在明清时期达到鼎盛，曾多次开展编修族谱、修缮庙宇等集体事务。然而历经战乱动荡，这些族谱资料已散佚无存。

义庄村在编修家谱的实践中屡屡受挫，其困境源于村庄社会结构与历史变迁的复杂互动之中，呈现出典型“分裂型村庄”特征。一是因为村庄“空心化”状态影响信息采集与宗族活动基础。其次，村庄内部权力结构的失序与信任机制的断裂。具体表现为既往村两委组织力的弱化和家族内部基于利益的派系竞争。在义庄村这一以同姓宗族占绝对数量的村落中，即使同属一脉，内部也分化为若干具有竞争关系的小宗族集团。因此村干部的作用也很难发挥，村干部往往更多代表和维护本亲族的利益，容易引发不公行为[20]。这种格局使得村庄公共事务易被卷入内部权力斗争的漩涡，难以形成统一的组织核心与行动意志。再次，核心领导力量的持续性缺位。在传统乡村社会，修谱这类宏大工程通常依赖于族中德高望重的精英人物主导推动。然而，义庄村的老一辈领导者长期居于城内，未能返乡主持大局，进一步加剧村庄内部的领导权威真空。最后，历史性创伤与资源整合的现实困境。由于时间跨度大造成“历史断层”资源协作时互不信任感凸显。

综上所述，义村家谱编撰的屡次失败，绝非偶然的文化事件，而是其作为“分裂型村庄”在人口结构、权力格局、领导资源、历史记忆与社会信任等多个维度上系统性困境的集中体现。要完成家谱编撰，不仅需要外部科技力量的必要支持，更根本在于促进村庄内部治理结构的优化、社会信任的重建以及乡村能人的回流与赋能。

如何解释和研究义庄村的家谱编修事件，杜赞奇提出的“权力的文化网络”理论具有启发性和参考价值。杜赞奇所研究的“权力的文化网络”既包括正式的等级组织，也包括非正式关系的相互关联网。文化指的是成员所认同的象征和规范，通过在网络中的交织赋予网络一定的权威，使领导权具备合法性[9]。该理论说明文化网络比经济资源、社会资本等更为重要，在这一网络中，以宗族伦理、地方信仰为代表的象征规范与权力正当性相互交织，赋予乡村治理以文化合法性，形成一种柔性化、非制度化的治理规则体系。这一结论深刻揭示文化网络在乡村治理中的

核心作用，也为当代乡村振兴中的文化治理提供理论参照。

然而，当代乡村社会已发生深刻变迁。传统“文化网络”面临三重挑战：首先，社会成员具有高度的流动性，人口外流削弱基于地缘血缘而产生的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其次，治理规则复合化，正式制度与非正式规范需协同适配。最后，技术媒介广泛使用，数字平台重构文化网络的传播与动员方式。基于此，本研究在继承杜赞奇理论核心的基础上，结合实地调研，提出“文化网络的动态耦合机制”，以更贴合当代乡村治理的现实逻辑。在符号生产机制中，杜赞奇的理论侧重既定文化符号的权威性，而当代乡村治理更强调符号的主动生产与重构。本研究中的家谱实践，通过挖掘风水禁忌等传统符号，赋予其新的治理内涵，实现文化认同的再生产。这一机制表明，乡村振兴中的文化治理并非简单复刻传统，而是通过创造性转化激活本土文化资源。在规则嵌套机制中，传统“文化网络”依赖非正式规范，而现代乡村治理需实现制度性规则与乡土逻辑的嵌套。在家谱修订中，宗族伦理与村民自治章程相互嵌入，既保留情感动员的柔性治理优势，又契合基层治理法治化要求。这种规则复合性超越杜赞奇理论中“非正式化治理”的单向解释。在技术赋能机制中，信息技术的普及使微信群、短视频等平台成为新型文化网络载体。村民通过微信群组织族谱讨论，利用短视频传播祭祖仪式，极大拓展文化网络的覆盖范围与动员效率。这一机制弥补传统理论对技术媒介的忽视，体现文化网络在信息化时代的转型。

上述三种机制并非孤立运作，而是形成“符号生产—规则嵌套—技术赋能”的耦合关系：符号生产为治理提供文化资本，奠定认同基础；规则嵌套实现治理逻辑的适应性调适，增强合法性；技术赋能拓展文化网络的影响力与参与度，提升治理效能。这一机制既延续杜赞奇对文化资本的重视，又通过动态性、技术性和制度性创新，回应当代乡村治理的复杂需求，为破解空心化引发治理失效的困境提供新思路。其理论价值在于，既衔接经典学术脉络，又通过实证研究修正拓展“文化网络”的解释边界，为乡村振兴中的文化治理研究提供更具时代性的分析框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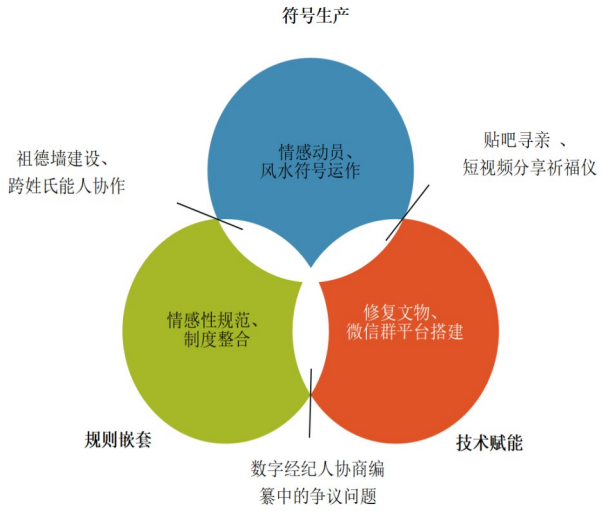


图1 乡村文化网络再生产

三、象征秩序的重构：文化网络中的共识凝聚

义姓先祖于明成化年间自晋南地区辗转迁至本地，逐步完成从“客民”到“土著”的身份转化。至明万历时期，该宗族通过土地垦殖与婚姻网络构建，实现人口稳步增长与社会资本积累，并于当时发展至占全村人口约百分之八十，达到宗族势力的历史高峰。新中国成立以来，义氏宗族虽经历多次社会制度变革，其传统组织形态趋于隐性，但仍通过担任革委会主任、大队书记等职务维系影响力。近年来，因人口流动加剧村民间关系渐趋松散，当前义姓族人约占全村人口的百分之七十。

（一）保护型经纪人的权威嬗变

在中国乡村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传统保护型经纪人的角色与功能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在这一转型过程中不同类型的保护型经纪人，都经历着权威形态的重构与调适。

义福佑是本次家谱编纂的核心人物，其权威基础呈现出明显的复合型特征。作为本村八大轮值家族后人（其祖上曾出过多位族长），这种宗族血脉为其提供天然的合法性基础。在1985—1995年两度担任村长期间，他通过三项举措带领村庄转型发展：实施“东田西烟”产业规划，创办村办造纸厂解决就业，并组织技术骨干赴安徽砀山学习种植技术，使本村酥梨先后荣获省优称号和1990年亚运会指定供应资格。这些经济发展

成就为其积累坚实的绩效合法性基础。退休后，他仍心系家乡，毅然放弃城市优越条件建设家乡。他凭借多年积累的威望和对村庄历史的详尽掌握，被村民尊称为“活地图”。义福佑对村庄历史、风俗习惯等“地方性知识”的熟练掌握，使其成为村庄文化记忆的载体，也成为其作为保护型经纪人的核心优势，中国乡村的权威体系正是由这些看似非正式的文化规范所维系[9]。

在参与乡村建设的过程中，他发现近年来村民的家族认同感、村庄共同体意识淡化。这种文化记忆的断裂，让他意识到重建家族纽带的重要性。事实上，早在2015年就有村民提出要重修家谱，但因人员分散、组织分散等原因而宣告失败。2020—2023年的特殊情况为重启这项工作提供契机：一方面，返乡滞留人员增多，长期在外务工的村民难以居家；另一方面，邻村刚完成的族谱编纂工作提供可借鉴经验。这一特殊时空背景，使得搁置多年的修谱计划重获实施可能。作为宗族文化的重要传承人，义福佑精准把握乡土社会的情感动员逻辑，适时提出“修家谱就是寻根脉”的动员口号，成功唤起村民的集体记忆与文化认同。面对普通村民，他将个人道德责任与家族兴衰相关联，成功激起村民的家族认同感。

针对以义姓村长为代表的村干部群体，他巧妙地将家族使命感和政治资本相结合。义福佑曾和现任村长强调：“村干部作为村里的‘当家人’，更应该多承担责任，把家族、把村子扛起来，只有村子发展好，你这个村长才能干得好①。”能人在突出村干部示范责任的同时，也为村干部指明积累政治资本的途径。对于乡贤能人群体，他强化家谱的“根脉”价值，通过展示部分家庭保存的家谱残卷，激发村民凝聚力同时暗示“不能忘本”，并顺利将本村文化能人、社会能人吸纳进来。通过情感动员，他成功组建包含三类核心成员的编纂小组：一是以义林为代表的返乡退休干部，有多年行政经验和良好的村民基础，能够将政策话语转述为村民可接受的表达。二是以义泽为代表的乡村文化能人（长期主持红白仪式），作为地方性知识的掌握者和文化资本的持有者，赋予家谱编纂以仪式合法性。三是以义弘为代表的现任村长，兼具行政权威与宗族身份，通过在政策执行和村民诉求间寻求平衡，体现现代经纪人的混合特征。这三类成员虽然构成编纂工作的主体力量，但在涉及祖先崇拜等核心议题时，他们的权威仍然面临着来自传统信仰体系的挑战。

这种挑战在祖先牌位问题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村民普遍认为“牌位移动会惊扰祖先②”，这种将牌位与家族运势紧密关联的传统认知，构成文化权力网络的核心节点。部分村民也利用“弱者的武器”[21]，以风水之名行抵抗之实。为了化解村民因风水禁忌产生的顾虑，义福佑特意请来镇上最受敬重的风水先生，并从传统伦理的角度，为出借牌位的行为提供合理解释，有效化解村民的顾虑。他向村民们耐心解释道：“供奉牌位本为追远慎终之举，今借出牌位以成全谱牒，非但无违孝道，实乃光耀门楣之善举。盖义庄村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谱系阙如，今上下同心编纂家谱，既可使先祖德业永垂后世，又能补历代先民未竟之愿，如此盛举，必能上慰先灵，下启子孙，获祖宗默佑于冥冥之中③。”

（二）神圣符号的现代性转化

在家谱编纂过程中，文化符号的创造性转化成为化解传统与现代张力的关键。能人和村两委通过转化风水禁忌完成祖先牌位信息的采集，并借助祖德墙建设实现宗族记忆的公共性转化，展现基层治理的创新智慧，为观察当代中国乡村如何重构传统符号体系以推动社会转型提供借鉴。

作为地方文化权威，风水先生和能人义福佑一起，通过三重策略重塑牌位借阅的文化意义，展现传统神圣符号在现代治理中的调适智慧。首先，重新诠释借阅牌位的象征内涵。能人邀请风水先生共同拜访村民，并援引《孝经》中“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的经典表述，打消村民疑虑，并告知村民“抄录牌位是为了让祖先的事迹流芳百世，不是冒犯，而是大孝④”。风水先生借

① 2024年10月1日山西中部地区义庄村能人的访谈记录。

② 2024年10月3日山西中部地区义庄村普通村民的访谈记录。

③ 2024年10月1日山西中部地区义庄村风水先生的访谈记录。

④ 2024年10月1日山西中部地区义庄村能人的访谈记录。

助义庄对“孝”文化的推崇，成功将档案整理工作升华为道德实践。其次，风水先生和文化能人共同设计一套完整的仪式流程，确保程序合乎传统规范。最后，义福佑以个人声誉作保，承诺全程监督以确保牌位安全，不会亵渎祖先。经过两个月的努力，编纂小组最终获得六大家族的牌位资料。这种传统社会特有的“人格化担保”机制产生显著效果，原本态度强硬的村民在参加祷告仪式后也欣然同意。

在家谱编纂工作推进的过程中，资金短缺逐渐成为制约因素。项目启动初期依靠村民自发募集的5130元资金很快面临不足。2022年5月，村委会召开特别会议。会上，村民代表义福佑和村长义弘共同提出由村委会暂借2500元专项资金，待编纂完成后用剩余捐款归还，这一提议立即引发争议。部分与会者认为，将集体资金用于支持宗族事务可能引发其他姓氏村民的不满；支持者则强调，家谱编纂是传承村落文化的重要举措。经过两个小时的讨论，会议最终达成共识，这笔借款将严格限定用于具有公共价值的基础资料收集工作，包括碑文拓印、墓志铭整理等任务，而不直接用于家谱的具体内容编写。村民自筹与组织托底相结合的创新性筹资模式，既守住公共资金的底线，又为文化传承提供必要支持，体现现代乡村治理中灵活性与原则性的有机结合。

然而，村委会动用公共资金资助修谱工作的行为引发少数姓氏村民的异议。郝姓作为第二大姓氏，其代表郝豹通过村民理事会提出质疑，认为公共资金用于单一宗族事务有失公平，其行为属于对少数群体的“制度性忽视”[22]。虽然部分村民持保留态度，但因义姓在村庄权力结构中占据优势地位，异议无法形成有效制约。这一矛盾反映乡村公共资源分配中公共性与宗族性的张力，其本质是现代化治理要求与传统宗族逻辑之间的结构性冲突。

解决这一困境的关键，在于找到一种能够超越单一姓氏、凝聚最广泛村民共识的文化符号。因此，村委会采取协商民主的治理路径。通过组织义姓代表、少数姓氏代表及村民理事会成员进行讨论，最终达成修建“祖德墙”的替代方案，该方案成功地实现红色文化与以“和”“孝”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融合。

在记忆主体方面，传统族谱以记载家族血缘世系为核心，具有天然的排他性。而祖德墙则将记忆主体从义氏一族的先辈，扩展至全村在战争年代牺牲的七位烈士和多位在本村有影响力的人物，这些人物涵盖义、郝、张三个主要姓氏。这一转变使得红色文化所承载的集体奋斗记忆与传统文化中的慎终追远精神实现有机结合。村民们祭奠的不仅是血缘上的祖先，更是为国家和集体做出贡献的村庄英雄，从而将宗族性的祭祀活动，升华为全村性的公共纪念仪式。在价值内核方面，光耀门楣是义氏家训中的重要传统观念。在修谱的语境下，门楣指代的是义氏一族的门第。而祖德墙的设计，将门楣的含义从家族的门户升华为整个村庄的门面。个人的功绩、家族的荣耀，只有融入村庄和国家的集体叙事中，才真正具有被铭刻在公共纪念墙上的资格。在仪式空间方面，传统族谱的供奉与查阅，空间上多局限于祠堂或家庭内部，而祖德墙建于村民文化广场，使其成为面向全村的开放性纪念空间，它成为全体村民共建精神家园的公共场域。

此外，村委会明确剩余修谱资金将转为祖德墙建设专款，并建立资金监管机制，以消除公共资源私有化的疑虑，将族谱中具有普遍教育意义的家规家训进行提炼，与从其他姓氏收集到的优良家风一起，镌刻在祖德墙上，成为全村共同遵循的道德规范。该方案成功实现从宗族叙事向村庄共同体叙事的转化。

四、规则嵌套中的权威生产：情感性规范与制度整合

在当代乡村治理实践中，权威的生产与维系往往依赖于传统情感性规范与现代制度体系的有机整合。义庄村的个案显示：家谱编纂项目的顺利实施得益于情感性权威与法理型权威的协同作用。

通过将乡土社会的情感纽带、道德规范与现代管理制度相互嵌套，村干部们成功创立一套兼具文化合法性与制度有效性的治理模式。在情感性规范方面，通过激活“差序格局”下的道德义务和人情网络，为正式制度的运行提供文化土壤；在制度整合方面，通过创新“梯度投放”“双轨制”等管理方式，为传统规范的现代转化

提供制度保障。二者相互建构的结果，不仅解决家谱编纂这一具体问题，更重塑村庄治理的合法性基础。

（一）情感性规范的象征性转化

资金筹措与信息征集作为家谱编纂工作的基础性环节，呈现出乡村社会治理的典型困境。在资金方面，项目面临集体行动困境。以义福佑为代表的村庄精英巧妙运用乡土社会的“差序动员”机制，构建宗族认同与道德压力相结合的三阶段动员模型，成功实现经济资本向象征资本的转化。在信息征集方面，由于历史资料严重散佚，能人们采取多元化的文化治理策略：一方面通过情感动员与文化权威相结合的双轨策略，借助宴饮叙旧等传统交往形式重建村民间的信任网络；另一方面引入风水先生等文化权威，以传统信仰资源消解村民对信息提供的顾虑，展现情感性规范如何被嵌套进现代治理的过程。

资金筹措的第一阶段是通过道德权威的“声誉抵押”策略完成社会资本向道德资本的转化，具体表现为发起人义福佑家捐款500元，并暗示村中同样具有崇高社会威望的村民跟随。在此影响下，约15户具有类似声望的家族跟进捐款，此阶段筹资约占总额的20%。其行为一方面展现自己作为本村道德样板的责任担当，另一方面也对他人形成隐性的义务绑定。这种“声誉抵押”实际上是将个人社会资本作为担保，为家谱编纂可信度背书，从而降低村民的信任成本。第二阶段体现为权力资本向伦理资本转化，具体表现为通过私下拜访等形式，说服血缘网络中的村长、村干部等正式权力体系中8位核心成员，让他们以“公家人”身份参与捐款。这种动员并非依赖行政命令，而是诉诸“干部要带头”的道德期待和伦理约束，以及下届选举时的政治红利，从而形成“干部带头”的示范效应。此外，能人们还积极发动和自己私交甚好的村民以及12位经济条件较好的在外乡贤（其子女多在城市工作，家庭年收入可达七八万元）进行捐赠。此阶段募得资金约占总额的45%。第三阶段呈现出宗族网络的扩散效应，即本家网络带头捐款，能人们充分利用庞大的家族结构，从兄弟家到堂亲再到远房亲戚。动员后的家庭又成为新的节点，逐渐扩散到更远的族人。“由土地产生的乡土社会是一个‘亲人社会’，人们以家庭为基本单位，世世代代居住在土地上，开枝散叶，繁衍子孙。”[29]凭借基于差序格局的动员方式将宗族认同转化为道德规训。在“半熟人社会”的场域中，捐款不仅代表着经济支持，更是道德声誉竞赛。封闭社区中的互惠规范会促使成员相互监督[24]，而能人制定的“50元标准”将经济贡献道德化，有效规避“搭便车”行为的出现。总体而言，本次筹资覆盖义庄村约52%的家庭，除部分低保户家庭外，其余家庭均完成捐款。作为典型的城郊村，该村户籍人口约800人，常住人口约410人，人口结构呈现明显老龄化特征，常住村民年龄主要集中在50至80岁之间。在收入方面，村内家庭以两代人共同生活为主：其中，以务农为主要生计方式的中老年家庭（50岁以上）年收入普遍在两万元左右；进行养殖或农产品销售的家庭，两代人年收入可达三万元左右；而有成员进城务工的家庭，年收入能达到六万元左右。此外，部分老年人虽可获得已定居城市子女经济支持，但因该部分子女已脱离本村户籍，其收入未计入本村家庭经济统计。通过“面子”机制，将宗族认同转化为一种隐性道德规训，使村民在“光宗耀祖”的话语框架下自愿服从，该动员策略不仅破解集体行动困境，更展现乡土社会“以德治村”的治理智慧。

在信息征集过程中，能人们采取“情感攻坚”策略。在长期的村庄治理中，能人通过日常互动、人情往来和利益互惠，在村民心中建立基于信任、恩惠与道德义务的深厚“情感账户”。为了激活情感账户，能人采取“情感兑现”策略，并以宴饮、叙旧等形式的“礼物交换”[25]，强化彼此情感联系。为说服村民出借祖先牌位，义福佑连续二十余日提着烟酒登门拜访：“当年你儿子结婚是我帮你相看的儿媳妇，结婚那几天我连轴转帮你找人找车……①”这种“人情债”的反复提醒，配合文化权威解释，使原本坚决反对的村民转变态度。“我这老哥哥一天天地请我吃饭，还和我聊过去帮忙的事，只要不影响我家的风水我肯定是会帮忙的②。”

① 2024年10月1日山西中部地区义庄村能人的访谈记录。

② 2024年10月1日山西中部地区义庄村普通村民的访谈记录。

（二）制度互构的合法性生成

2021年底资金募捐完成后，如何提高资金利用率成为新的挑战。此时完整的族谱已在特殊年代散佚殆尽，记载家族发展史的石碑也已损毁严重。了解家族发展史的中坚力量大量外流，个别在村老人虽然对家族历史记忆犹新，但是缺乏系统复盘历史的能力。村干部意识到，只有家族情感是无法完成这项文化工程的，为此建立一套科学有效的资源支持体系。2022年初，村民成立家谱编纂工作小组，6月成立专门的资金管理小组，由本村会计担任小组长，并创新性地提出“梯度投放”管理模式。该模式根据工作的重要性和技术难度，将有限的资金划分为四个层级进行配置，从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第一层级是核心编辑团队。由能人义福佑和两位退休老教师、一位村史爱好者组成。他们每人每天可获得100元补助。其中一位退休教师主动请缨担任副主编，还说服在省城工作的儿子一同参与在河北和山西洪洞寻亲。村委会为此专门设立差旅费专项。第二层级是技术性较强的碑刻整理工作。村委会以每天300元的预算（含设备租赁费）聘请六名有挖掘及修缮经验的村民，组成专门的碑文抢救小组。2020年8月，该小组发现一块万历年间记载义氏先祖修建村庙的功德碑。第三层级是基础性的信息采集工作。村委会动员二十余名村民，按照每人每天70元的标准，负责入户访谈和简单资料整理，并在后期将之编写进本村村史。第四层级是1500元的应急储备金。2022年9月，编纂小组发现一批清朝时期的碑刻文物，急需资金进行专业修复和数字化处理。储备金的及时启用，使得这批珍贵史料得以保全。

为确保资金使用的透明公正，村委会建立一套完整的“双轨制”的管理制度。在现代治理维度，严格执行“三公开三监督”制度：每月15日，会计在公告栏张贴详细的资金使用明细，包括每一笔收支的办理时间、办理事由、具体金额和经手人。2023年3月，有村民对一笔630元的设备租赁费提出质疑，村委会立即组织核查，审核无误后再次张贴并告知该村民。这种透明化的操作方式，打消村民的疑虑，树立村委班子的公信力。在传统治理维度，则创新性活化“村庙议事”等乡土机制。村委会在作出重要决策前邀请族老面对村庙召开“板凳会议”，这种方式既符合现代管理规范又尊重传统的议事方式。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义庄村的家谱编纂工作于2023年圆满完成。最终统计显示，整个项目实际支出7630元，比预算节省370元。这种制度融合产生显著的治理效能，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严格的现代管理制度确保资金安全，全年未发生任何违规使用情况；另一方面，传统议事形式提升村民参与热情，自愿参与者逐渐增加。村委会在实施过程中充分发挥各参与主体的优势，这种分工既提升效率，又保障历史信息的准确性。该模式突破宗族事务的封闭性，将单一活动转化为公共文化工程，丰富多中心治理的实践内涵。

家谱编纂后期面临印刷经费不足的困境，妇女主任凭借私人关系联系印刷厂，反复协商后降低成本。村干部有意识地将其转化为提升组织公信力的契机，在村民大会上详细说明成本节约的过程，并赢得村民的广泛好评。

在程序建设方面，村委会通过创新性的协商机制将传统的宗族事务纳入现代治理的框架之中。在具体编写过程中，编纂小组组织两次民主协商。第一次协商重点解决编纂体例等具体技术性问题，参会者包括村内各领域能人代表、家庭代表和文化程度较高的年轻人。第二次协商则主要针对资金分配及使用方案，编纂资金筹集完毕后，村委会曾小范围地组织文化能人和会计对资金使用进行初步规划，随后将讨论后拟定的预算在村民微信群公示。这种既尊重老人权威又保障年轻人参与权的做法，促进代际间的文化交流互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决策方案。透明化管理是程序建设的另一个创新点。村委会建立定期公示制度，每月发布工作进展和资金使用情况。在核对家族信息时，村干部采取“三次确认”的方式，即初次上门交流收集家族信息，将初步整理后的信息发给其家族成员进行二次核对，无误后将个体的家庭信息归并至完整的家谱初稿中，并于群内公示一周进行终版校对。

五、文化记忆的数字化重构：技术赋能下的乡村文化网络再生产

在数字化转型的大背景下，吉登斯的“时空

延伸”在当代中国乡村社会呈现出新的实践形态，义庄村民通过数字媒介重构乡村社会的时空秩序[26]。首先，在物理空间维度，不在村的村民通过微信群表达看法，打破原有因时空限制而导致“缺席”的传统困境。其次，在时间维度，村民熟练使用现代工具极大压缩编纂时间。最后，在历史记忆维度，通过扫描技术生成PDF，以数字为载体保存历史资料，开启“数字代际”的新型传承方式。

（一）虚拟空间的符号协商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普及，以微信、抖音等为代表的一批大众媒介已经逐渐渗透到农村，它们在丰富村民休闲生活的同时也对农村公共事务的开展、村民们的集体行动的达成产生重大影响，即使不在村的村民也可以参与到乡村生活之中。因此，“优秀乡土文化的传播必须顺势而为，充分合理地利用好互联网这一工具[27]”。

在家谱编修初期，联络分散的家族成员困难较大。为此，村中长者动员传统社会关系网络进行联络，并借助微信等媒介扩大寻亲范围。年轻一代村民则通过百度贴吧等平台发起“义氏寻亲”活动。村民自发将修谱信息转发至抖音等平台，外乡村民通过点赞、评论和转发实现“脱域化”参与。村民从村内公共服务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积极参与者，村民既能在数字平台讨论家谱编修细节，也可自主发起寻根活动，或直接在村干部账号下留言。为提升沟通效率，能人组建微信群。该群最初主要用于信息核对、事务公示和家族历史交流。为避免活跃度降低，义福佑定期在群内分享村内旧照、家族合影等影像资料。通信群组逐渐演变为记录个人成长与家族发展的情感空间。村民开始在群内自发分享生活回忆，并通过节日红包等数字化互动形式增强社会联结。

微信群作为大众媒介，其功能经历从基础通讯到参与式治理的演进，重构乡村治理的权力结构。最初仅用于联系家族成员，后期成为制订计划、监督执行的有力工具，其作为一种工具把原本垄断在村干部手中的权力赋能给了普通村民，让村民们有了参与感，也促进村务公开化。具体表现为村民代表通过微信群发布家族信息供集体审核，会计实时公示资金使用情况，实现村务信息的即时共享与流程简化。数字化平台有效解决传统村务管理中存在的信息滞后与程序烦琐等问题，提升治理效率与透明度。村民不仅是信息共享和传播的主体，也逐渐演变为信息再生产的主体。他们以家族成员的身份参与村庄的公益性服务活动以及村庄文化实践活动，并生成“情感权力”与“道德资本”，从而在村庄中拥有更多的话语权，也为不在村的村民提供更多获取公共资源与服务的机会。大众媒介不仅横向拓展村民的交往半径，更纵向培育公共意识。

弗里德曼认为家族利用公产和公共仪式实现家族成员的文化认同[28]。家谱编纂完成后，以义福佑为代表的文化能人和村委会干部协商后，决定举办一个简单的仪式。经过村民协商，决定将举办仪式日期定在阴历四月十八日。这天是义庄最为重要的日子，相传是村庙守护神——圣母娘娘的诞辰。义庄人把四月十八日定为庙会日，庙会规模庞大，吸引众多村内外村民到场参与。仪式举行由能人义福佑和村长义弘为圣母娘娘点燃第一炷香，以保佑后世子孙能够壮大家族。村民通过社交媒体录制短视频，并分享自己对后辈和村庄发展的期待，不在村的村民也从线上感受到村庄的发展。由此可见，集体记忆是社会群体共同拥有的记忆，它通过文化符号、仪式和传统等形式得以传承和延续[29]。

（二）技术经纪人的合法性建构

在家谱编纂过程中，技术经纪人通过数字媒介平台推动传统宗法观念与现代价值的创造性转化，构建独特的合法性生产机制。在编纂实践中，代际价值冲突集中体现在过继子嗣和外嫁女入谱资格等争议议题上：年轻群体主张性别平等入谱原则，而老一辈则坚持传统父系宗法规范。以村干部与妇联主任为代表的技术经纪人采取渐进式调适策略：首先通过微信群投票确认传统框架的合法性基础，提出“预留三页空白”的创新方案，即虽然不统一记载女性成员，但各家庭的家谱均留出三页空白，以方便有志于记录女性成员贡献的家庭记载家族变迁。该策略既维护宗法权威，又实现性别观念的渐进变革，体现技术经纪人在价值冲突中的调停智慧。在数字公共空间治理方面，技术经纪人发展出系统性管理技术。

面对群组内出现的广告推送，管理员实施三重治理机制：一是严格身份认证制度，二是定期公示群规，三是建立违规惩戒机制。这些举措保障微信群组的沟通质量，使其持续发挥情感联结与需求反馈的双重功能。这种管理技术体现数字经纪人的专业素养，彰显其在连接传统与现代过程中的关键作用。

面对文献资料缺失的困境，村民采用数字化工具与传统方法相结合的史料收集策略：录音设备采集老人口述历史、微信工作群实现编纂进度的实时共享与协同校对、专业人员拓印并数字化存档。这一过程呈现出明显的代际协作特征：中青年群体主要负责数字化处理，长者则承担历史信息核验工作。由于村庙已不复当初，碑文也模糊不清，使得实物史料还原更加困难。因此，村委会组织本村有过拓印经验的专业人员将碑文内容保存下来，并对石碑碑文进行抢救性整理。当技术经纪人将功德碑的修复成果在微信群展示时，既证明工作的专业价值，也强化自身作为文化传承者的权威地位，技术经纪人在共同体建构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祈福仪式结束以后，负责人通过广播和微信发布感谢信，将数字互动转化为实体联结。该实践不仅完成家族历史的数字化保存，还催生一系列文化复兴运动。村民对村庙文物进行数字化处理，实现“文化资产的保值增值”。家谱的成功编纂点燃村民文化建设的热情，村民们也因此掀起村庙重修的活动。不仅吸引更多在外村民为村庙重修捐款，还聘请文物专家对本村水陆相（寺庙文物）进行复原。缺失已久的村史介绍、庙宇来历、村民奋斗史也在广大村民的共同努力下编纂完成，留下珍贵的文物资料，形成“数字记忆”与“实体空间”的良性互动，跨场域协调使技术经纪人获得传统权威与现代专业双重认可的合法性基础。

村民提出要深入挖掘家谱中家风家训的深层次文化内涵，并将其与当代社会主义文化相融合。因此，村庙重修以后，村庙内不仅展示本村的大事年表，还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依托家风家规精神内核所编纂的村规民约贴在庙宇门口，村民之间、干群之间也在文化互动中积累文化资本。

六、结论与讨论：文化网络再生产中的耦合机制与治理创新

义庄村的个案研究表明，即使是面临“分裂”困境的村庄，也蕴藏着通过文化网络再造实现集体行动的潜力。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的文化网络正在经历深刻变革。传统宗族权威的延续与嬗变、保护型经纪人的角色调适、神圣符号的现代性转化及数字技术嵌入后技术经纪人的诞生，共同构成乡村文化治理的复杂图景。在此过程中，宗族记忆的再生产不仅是对历史的追溯，更是一种文化权力的重新分配与社会资本的再积累。

如图2所示，符号生产与秩序重构揭示了乡村治理中传统与现代的张力。义福佑作为义庄的保护型经纪人，兼具宗族血脉、绩效合法性与文化资本的地方能人多重身份。他通过情感动员、道德话语重构以及资源整合，将家谱编纂这一宗族事务转化为村庄集体行动，展现传统权威在现代治理中的适应性。这表明乡村权威的合法性不仅依赖于经济绩效或行政权力，更依赖于其对文化符号的掌控与再生产能力。神圣符号的现代性调适反映文化符号在乡村治理中的创造性转化。风水禁忌的重新诠释、祖德墙的公共性建构以及牌位采集的仪式化处理，均表明传统信仰体系通过符号意义的重构而融入现代治理。



图2 乡村文化网络

成功的乡村治理往往依赖于情感性规范与正式制度的创造性融合。村委会作为村庄利益的代言人，村干部利用私人关系节约成本，并在本土

能人的帮助下创设性地提出“梯度投放”资金管理模式、“双轨制”监督机制等措施，体现传统乡土逻辑与现代管理技术的有机结合，这种制度嵌套提高治理效率和村民对村干部的信任度。但也暴露乡村治理的深层矛盾。如公共资金用于宗族事务引发的公平性质疑，反映乡村资源分配中宗族性与公共性的张力。村委会通过祖德墙建设等策略化解这一矛盾，实现对宗族网络和宗族权力的“嵌入式”改造。

数字媒介的介入为乡村文化网络的重构提供新的可能性。微信、抖音等平台打破传统乡村公共事务的时空限制，使不在村的村民得以参与家族事务，拓展治理边界。技术经纪人通过线上协商等方式，推动乡土文化的数字化保存与传播，重塑乡村权力结构。年轻一代在技术应用中获得更多话语权，传统权威则通过技术赋能巩固其文化合法性。

家谱编修这一古老的文化实践活动，在义庄村干群共同努力下被赋予崭新的治理内涵。这一过程深刻说明，对于许多“分裂型”村庄而言，治理创新的关键在于识别并激活村庄内部残存的文化“基因”，并通过现代性的转化，使其成为重新联结个体、促成集体行动的粘合剂。家谱编纂在义庄村，已超越单纯的宗族文化传承，演变为一种在现代化背景下修复社会联结、再造治理共同体的战略性实践。因此，义庄的故事并非单一的文化实践个案，更是洞悉当代基层事务运转的缩影。

参 考 文 献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16，65，60.

[2] 胡小武. 因村施策：农村人口空心化陷阱及发展路径转型研究[J].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44（6）：50-60.

[3] 桂华，贺雪峰. 再论中国农村区域差异：一个农村研究的中层理论建构[J]. 开放时代，2013（4）：157-171.

[4] 吴理财，解胜利. 文化治理视角下的乡村文化振兴：价值耦合与体系建构[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16-23，162-163.

[5] 王亚华. 乡村振兴中的文化振兴路径探析[J]. 中国农村经济，2021（5）：12-24.

[6] 徐勇. 乡村治理转型中的传统与现代[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58（3）：1-10.

[7] Shin G W. Ethnic nationalism in Korea：genealogy，politics，and legacy[J].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1）：40-42..

[8] 吴兆龙. 宋元徽州家谱研究[D]. 芜湖：安徽师范大学，2017.

[9] 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3-23.

[10] 傅琼，曹国庆. 乡村“权力文化网络”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6省560户样本的调查[J]. 江西社会科学，2016，36（12）：208-214.

[11] 王志龙. 近代皖中宗族对家谱的保护研究[J]. 学术界，2024（4）：166-176.

[12] 王清华. “共同感媒介”：流动时代的家谱续修与团结再造——基于皖北ZS氏的个案调查[J]. 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2024，48（6）：110-119.

[13] 许烺光. 祖荫下：中国乡村的亲属、人格与社会流动[M]. 王芃，徐隆德，译. 台北：南天书局有限公司，2001：197-198.

[14] Maurice Freedman. *Chinese lineage and society：fukien and kwangtung*[M]. London：Athlone，1966：31.

[15] 赵亚川. 文化治理视野下的宗族复兴：甘肃连城铁氏谱庙重修中“历史”叙事的构建、拼装与诠释[J]. 民俗研究，2024（2）：40-48，157-158.

[16] 韩鹏云. 乡村文化的历史转型与振兴路径[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19（4）：1-9.

[17] 汪倩倩. 文化治理：“以孝治村”的形成机理与运行逻辑[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0（5）：102-108.

[18] 胡惠林. 乡村文化治理能力建设：从传统乡村走向现代中国乡村——三论乡村振兴中的治理文明变革[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1）：50-66.

[19] 常建华. 宗族志[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300-301.

[20] 聂建亮，赵腾，吴玉锋. 村庄社会结构视角下村域共富的实现路径[J]. 学习论坛，2024（2）：83-91.

[21] 斯科特. 弱者的武器[M].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2-3.

[22] 曼瑟尔·奥尔森. 集体行动的逻辑[M]. 陈郁等，译. 上海：格致出版社，2011：27-28.

[23] 谢天. 文化共同体构建与传统文化治理资源开发[J]. 文化与传播，2024，13（1）：121-126.

[24] 帕特南. 使民主运转起来[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200-202.

[25] 阎云翔．礼物的流动[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110-115.
[26]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16-26.
[27] 张妍．乡土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的意义、困境和路径研究[J]．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46（5）：79-88.
[28] 莫里斯·弗里德曼．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M]．刘晓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105-119.
[29] 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M]．华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87-90.

Cultural network reconstruction and innovation in rural governance mechanisms： a case study of genealogy compilation in Yizhuang Village， Shanxi Province

MU Liangze，LIU Xinxiu

（*Institut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Research*， *Shanxi University*，*Taiyuan* 030031，*China*）

Abstract：This study，taking the "divided" village of Yizhuang in central Shanxi as a case，to explore how traditional cultural resources facilitate the reproduction of cultural networks and activate effective rural governance through three mechanisms：symbolic production，rule nesting，and technology empowerment.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in terms of symbolic production，protective brokers reconstruct cultural symbols，transforming clan memories into public identity，thereby providing cultural legitimacy for village governance. The rule nesting mechanism integrates affective norms with modern management systems，preserving traditional moral authority while enhancing governance efficiency. The technology empowerment mechanism，relying on digital media，transcends spatial and temporal constraints，enabling absent villagers to achieve "disembedding participation." Technology brokers mediate conflicts between patriarchal values and modern ideals through online deliberation. The study demonstrates that achiev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divided" villages requires not only external resource inputs but also the activation of the governance potential embedded in local cultural networks，thereby reconnecting divided individuals and realizing effective rural governance.

Keywords：Cultural networks；Rural governance；Symbolic production；Authority adaptation；Technological embedding；"Divided" village